

调查研究能力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本报特邀评论员 周文彰

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调查研究，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情况，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只有这样才有发言权

每周时评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调查研究能力是必备的基本功，是领导干部素质和水平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在他提出的中青年干部要提的“七种能力”中，“调查研究能力”的提高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我们也常常发现，面对当前我国发展中面临的复杂环境，一些年轻干部不知怎样认识调查研究，对于怎样提高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也找不到门路。

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就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调查研究。千言万语，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是为了做到从实际出发。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我们制定的方案、发展思路、远景规划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从过去的或别人的经验出发，即使获得一时成功，也只是侥幸或偶然而已，不可能复制。电影《渡江侦察记》反映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渡江战役的成功而进行的调查研究——“侦察”，目的是透彻地搞清楚江南的防务，比如工事状况、兵力安排、炮火布防、阵地位置等等。如果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渡江战役就只能是一场盲目的、碰运气的战役，绝少有胜算的可能。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最著名的而且是最有影响的，就是他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因为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所以在党的早期领导人照搬照套别国经验而碰得头破血流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才能够正确地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这样一条战略思路。实践证明，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为了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的各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亲自调查研究，足迹遍布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山村农户、军营边防，一再叮嘱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这是谆谆告诫，也是殷切希望。我们不可否认，掌握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多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听汇报、看材料、委托调查研究等等。但是要掌握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仅仅停留于此、甚至依赖这些做法，是非常不够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调查研究，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情况，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只有这样才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哪能有发言权。

那么，应该怎样进行调查呢？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态度，一个是方法。上级要求调查研究，于是就下去“走过场”，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这便是严重的态度问题——调查研究变

成了装门面、做样子，既是官僚主义，也是形式主义。态度不端正，就谈不上有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也听不到真话。正确的态度是，调查研究是出于掌握情况、做好工作的愿望，是责任的推动、党性的驱使。态度端正了，调查研究的结论是不是就一定正确呢？不一定！因为调查研究还需要科学的方法和较高的思维水平。道理很简单，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比如，为了制定一个地方的发展战略，不同的领导去调研，结论就可能大相径庭：工业经济口的领导往往重视的是丰富的矿产，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而农业经济口的领导更看重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源等自然禀赋，主张优先发展农业；旅游经济口的领导则主张优先发展旅游业，因为这里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底蕴深厚的文物古迹……同样的调查研究，为什么三种类型的领导会提出三个不同的方案呢？就是因为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我们人的大脑主观状态跟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的过程，因此，知识背景、动机愿望、工作责任等等不同，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大脑所想到的就很不一样。调查研究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挂一漏万，更不能以自己的主观好恶而随意取舍材料，而要

客观、全面、深入、公正，多看实地，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对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要认真研究分析，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形成比较正确的调查结果。

接着就是如何对待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是关系到调查研究的价值能不能实现的重大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应当及时转化为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措施、实际行动，切忌束之高阁。如果调查研究的结果不足以成为决策依据，就要在更深入、更广泛的层次上再次进行调查研究。总之，情况不明，绝不决策。对已经成为决策部署的，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整，直到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发展规律、合乎人民民意。

调查研究能力是一种与实际密切相关的能力。既然我们只能在“游泳池中学习游泳”，那么，我们也只能在调查研究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只有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断反复学习总结，才能够逐步提高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说话

要加快出台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健全“三育”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支持“三育”的家庭福利体系等

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调整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未来的10—15年，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深度融合，因此，我们需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与人口结构优化高度重合，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结构性政策调整，实现人口世代更替基本平衡。

目前我国面临高龄少子化的挑战，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这个挑战来得太早，应对的时间空间约束更强。要客观认识高龄少子化阶段性特点，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提出讨论。

第一个问题，我国高龄少子化的趋势有没有“固化”？

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龄少子结构已经“固化”有所不同，我国高龄少子化的趋势仍有动态变化的某些特点。一是生育意愿变化带有阶段性、结构性的特点。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全球趋势。从我国的情况看，2020年人均GDP仅有1.05万美元，中低收入者仍占多数，并且我国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很难简单与发达国家的国情相类比。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高于目前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3的实际数值。二是生育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尽管这几年生育年龄人口有下降趋势，但2020年育龄妇女人数仍有3亿多人，绝对规模仍比较大。如果每年有4%左右的育龄妇女生育，就能够使新出生人口维持在1200万以上，从而可以使人口负增长拐点出现的时间尽可能延迟。三是实际生育率受政策影响大。“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加上有效实施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政策，估计部分“80后”“90后”“00后”生育“二孩”“三孩”还有相当大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生育率低的核心问题是不是“三育”成本过高？

随着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城乡居民的生育行为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功利性生育意愿逐步淡化；另一方面，家庭普遍重视生育、养育、教育质量，“三育”成本不断水涨船高。

今天，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通常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开支。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2万元左右，一对夫妇加起来6.4万元左右，对于一般收入家庭来说，生育、养育、教育等负担过重的问题确实带有相当的普遍性。2019年我国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0.6%，远高于47.7%的全球平均水平。孩子的生育、养育、教育，往往会给女性造成较多的工资收入损失，甚至失业或失去升职机会等。总的来看，“三育”成本过高导致“生不起”的矛盾较为突出。因此，需尽快将更多“三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范围，如健全“三育”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实施覆盖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补贴政策，形成支持“三育”的家庭福利体系等。

第三个问题，未来10—15年是不是应对高龄少子化的关键阶段？

未来10—15年是应对高龄少子化的最后“窗口期”。从人口生育周

客观认识高龄少子化阶段性特点

迟福林

期看，一代人口更替的重大趋势性变化需要大约10—15年，即使我国未来5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拐点，还会有10年的矫正期；未来10—15年，我国仍有条件保持4%—5%的经济增长。由此，调动更多财政资源、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社会资源等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仍比较大；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和解决高龄少子化及其所带来的潜在生产率下降问题，以及未富先老问题。因此，要加快出台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与制度体系。

同时，要促进总和生育率回升、提高劳动参与率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相结合。未来10—15年，我国的人口结构面临两个负增长：一是自2012年以来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二是即将到来的总人口规模的负增长。要高度重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统筹考虑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目标，把支持生育政策、延迟退休政策、积极就业政策等有机结合，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生产率。

此外，还要实行以支持家庭发展为导向的社会政策调整。我国高龄少子化伴随着家庭的小型化、离散化。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当前，养老育幼的福利政策设计基本上以个人为核算单元，在平衡家庭关系上的作用明显不足。这就需要以家庭为单位统筹考虑“三育”福利政策的实施，有效整合民政、人保、税收、卫健等方面的资源，精准提升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和福利输送能力。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向世界呈现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

贺云翱

名家论道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百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些年来，中国考古的学术成果在中华文明探源、文旅事业融合、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城市城镇建设、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国家软实力和文明形象建构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求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和研究工作中首先要展现出“源远流长的中国”，告诉公众许许多多的中国文化因素是何时、何地深深植入到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展现出“文化多样的中国”。地理背景的丰富性和多民族使中国考古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考古工作者要努力揭示出一个引人入胜、文化多样的中国。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展现出“传承创新的

国”。从城市格局到建筑结构，从器物造型到图案花纹，从文字、绘画到雕塑、铸刻，从墓葬形制到墓室装饰，中国文化因素历经千年、万年而延承不绝，但又绝对不会看到前后不同时代的“文化”完全属于守旧或抄袭，无不讲求在传承中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展现出“开放包容的中国”。无论是在东亚邻邦，还是在南亚、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都可以发现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文字、绘画、纹饰、宗教文物等；同时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来自异域的古老的小麦、马车、葡萄、玻璃、杖杖、香料、乐器、服饰、玉石、青花钴料以及袄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遗存。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展现出“保护发展的中国”。当代中国高度重视考古遗产的保护利用，并将其纳入现代化发展的宏伟事业中。考古工作者应该运用自己的考古发现形成的创新知识体系成为各种传媒、教科书、文化创意产业以及美术、建筑、宗教、文学、历史、环境等学科的知识信息来源。

近年来，考古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并激发起人们对考古的兴趣和热情。但学术性考古相对晦涩难懂，与大众的距离较远。让考古“活”起来并进一步走进大众，大力推动公共考古发展是必要方式。公共考古就是要让普通大众对考古能看懂并产生兴趣，让考古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转化为社会知识，惠及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考古本身就有公共资源的属性。如何体现公共性？我们要通过公共考古让考古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文化价值，通过通俗的语言和易传播的方式传递给社会和大众。例如可以在保证文物安全和参观者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考古现场，在现场布置展览，边发掘边展示，并提供讲解等服务，让公众近距离了解考古过程；建设一些带有公共性质的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把这些建设纳入城乡规划，纳入到文旅融合发展中，形成体系建设，真正实现考古学与社会之间融为一体；在考古机构中增设公共考古部门，大学增开公共考古方向硕士专业和相关课程，加强公共考古人才队伍建设；把公共考古纳入科普事业，与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开展考古研学、考古夏令营、小小考古学家等活动；还可以依托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通过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向公众展示考古知识。

考古学的遗迹、遗物、环境、空间资料、理论提取乃至真知灼见，保存和书写在广阔的大地上，而不是收藏于斗室中。考古学的实证性材料隐藏在历史的长河中，非一日之功可以发现，有时一个关键的逻辑性材料需要数年或数十年时间的等待和寻觅才可能现世，这需要当事人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许多考古学家为了解决某一发现的来龙去脉，持之以恒地奔走于田野、求索于文献、交流于同道，数十年如一日。

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史告诉我们，考古工作者最佳的“课堂”和“研究室”在田野。未来，我们考古工作者应该继续秉承知行合一、重在田野、持之以恒、甘于奉献的精神，做好中华文明的阐释者，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呈现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k快评

加强国家生物安全建设刻不容缓

陆忠伟

全的全球属性，亦对人类家园与世界安宁造成重大影响。鉴于此，掌握维护生物安全主动权，塑造有利的生物安全态势，实乃国家安全必保的底线及必争必胜之战。

生物安全风险是指国民生命健康和国土生态系统受到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包括新发及突发传染性疫病、新型生物技术的误用及滥用、非法研制乃至悍然使用生物武器对他国构成威胁、恐怖组织借此策动大规模生物恐袭，以及外来有害物种大规模入侵等等。

究其根源，一是源于自然界的病毒。如大瘟疫、大流感等“不速之客”。二是借助动物宿主繁殖扩散的病毒。SARS、寨卡病毒超过天人界线致人感染。三是生物技术与相关材料失控，流入人间遭致病。四是生物武器阴谋不散，恐怖组织视之为“神风特攻”，某些国家视之为战争获胜的“一枕黄粱”。

此次世纪疫情将生物安全风险展现无遗。例如，美国因疫而殁人数高达越战阵亡美国人的两倍。加强生物安全防护并非仅就世纪疫情来袭的急就章。毋

宁说，生物安全与边防、海防、空防、天防及网防相提并重，乃更高层次、更大范畴的战略问题。鉴于此，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免受潜在新型病毒侵袭，乃“国之大事”的先手棋长远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生物安全工作。9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贯彻落实生物安全法”。

习近平总书记以整体思路规划，以发展视野布局，对国家生物安全加以科学性、战略性及战略定向，视之为“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及“国家总体安全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辟论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生物安全的内涵外延。

我国以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生物安全法为标志，已形成包括生物安全战略与相关法律、政策于一体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这充分表明党中央维护及塑造国家生物安全有利态势的坚定决心。

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惟众人拾柴，凝才聚力，才能解决船和骥的问题。换言之，应不断提高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能力；依法加强伦理和过程管理；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多双边机制建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WEIPING 微评

新闻事件：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粮减损举措更加硬化实化细化，推动节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成效”。

点评：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粮食需求也刚性增长，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只有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行，才能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确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新闻事件：日前，《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公布三年成绩单，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0.9个百分点，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

点评：一方面要防止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另一方面要让教育领域的减负改革真正落地，让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去开拓视野、强健体魄。不光摘掉“小眼镜”，更要快乐成长。

新闻事件：时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日渐庞大。他们风里来雨里去，起早又贪黑，在争分夺秒地为人们提供便利之时，自身却面临着种种不便，时常遇到停车难、进小区难、充电难、午休难等问题。

点评：努力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急难愁盼”，反映出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是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推动相关行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选项。

新闻事件：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先进的“数字化基建”在许多地方出现走样跑偏，不仅没有达到“方便”“减负”的初衷，反倒给基层增加了不少负担，沦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

点评：“数字形式主义”，其实质还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电子政务建设应当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标准，关键是考评指挥棒要求务实，在不断创新“形式”的同时，破除一切有害的“形式主义”。

新闻事件：近日，广东在全省范围推行“居家上门服务证”，打破阻碍家政行业良性发展的一道道“关卡”，以放心家政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加码。

点评：家政人员“持证上岗”并纳入规范化管理，从业人员实现“可查询”“可溯源”“可评价”，让消费者更加安心。期待“居家上门服务证”更好落地、推而广之，让放心家政走得更稳更远。

〔本期点评：朱婷〕